

英國社會民主黨的崛起與發展

王切女

一、前言

今（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工黨四位內閣大臣（被戲稱爲「四人幫」）詹金斯（Roy Jenkins，前財政部長）、歐文（David Owen，前外交部長）、威廉斯夫人（Mrs. Shirley Williams，前教育部長）與羅杰斯（William Rodgers，前運輸部長）爲首的工黨溫和右派人士，正式宣佈於九個城市成立「社會民主黨」（the Social Democrat Party），並積極地與自由黨談判採取聯合策略，爭取下屆大選的議席。

七月間，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曾根據社會民主黨與自由黨的聯盟（以下簡稱「聯盟」）在北部赤郡（Cheshire）的瓦靈頓（Warrington）區國會補選中所獲得的票數——從保守黨獲得了四分之三的選票，從工黨獲得了四分之一的選票，加上自由黨原先所獲得的選票——，假定每個選區投票的情形都像瓦靈頓區一樣，則在大選中，「聯盟」可獲得國會六百三十五席中的五百零一席，工黨只能獲得一百一十三席，保守黨僅能保有一席。再者，自今年年初以迄九月下旬，英國各大報所發表的民意測驗也一再地顯示出，假如即刻召開大選，則「聯盟」將可獲得百分之三十一四十左右的選票。

另一方面，英國首相余契爾夫人却批評社會民主黨是一「無根、無原則、無哲學、無價值的黨，就像一盤無根之花，初看美麗嬌貴，但未幾終將凋零。」工黨的副黨魁海利（Dennis Healey）則批評社會民主黨是一「無組織、無政策、徒有將領不見兵士而匆促成軍之黨」。

然而，社會民主黨是否僅是曇花一現？或將如民意測驗一樣，其與自由黨的聯盟能獲得百分之三十一四十選民的支持，進而打破英國自一九二〇年代即已確立的兩黨政治的局面？本文擬從社會民主黨成立的背景、基本主張、權力結構與黨員的背景、及其與自由黨的聯盟，來探討其崛起，進而分析其對英國政黨政治所可能帶來的影響。

一、社會民主黨成立的背景

社會民主黨成立的直接導火線是一九八〇年工黨布列克坡爾（Blackpool）大會通過了不利於工黨議會黨團（由工黨國會議員組成）的決議，且在今年一月工黨溫布萊（Wembley）特別大會中，左派澈底地操縱了黨大會。部分工黨右派人士面對衰退的英國經濟，目睹工黨路線趨於極端左傾，而保守黨則採行強硬的右傾路線，遂毅然地組成了中間派的社會民主黨。

一九七九年五月的大選中，保守黨以絕大多數的票數取代工黨組閣，面對着衰退的英國經濟，余契爾夫人採行了強硬的經濟措施，包括：降低貨幣的供應量；減少或不增加政府的支出；降低高所得者的稅率以鼓勵生產；停止對效率較差的公營與民營工業之支持；減少法律對工、商業所加予的限制，強調市場競爭的紀律，迫使產業自行奮鬥或關門；將部分國有產業轉變為民營；限制工資的增加與消除產業強迫雇用（工會迫使雇主雇用較實際所需為多的工人或減少工時，以避免失業）的慣例；儘量給予私人企業所需之幫助^①。然而，余契爾夫人以貨幣主義為主的經濟措施，徒使失業人口從一九七九年上半年的百分之一百三十萬增加至目前的三百萬，通貨膨脹雖從一九七九年第二季的百分之十三點五，降為今年七月的百分之十點九，但八月則再度上升為百分之十點五。工業生產總指數今年七月比去年七月相比，下降了百分之五點八。今年五月三十一日，工會曾發動了十萬人的失業遊行，抗議失業人口的增加。然而余契爾夫人顯然仍未變更其經濟政策。

由於余契爾夫人所採取的強硬經濟措施很不利於工會，更加強了工會長久以來想要引導、形成與控制工黨的決心。工黨的成立，本來即是工會為了達成其經濟目的而組織起來的。早期工黨被認為是壓力團體，其作用是在現有的經濟制度下增進工人階級與工會的利益^②。更何況工會一向是工黨財政的主要來源，工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都來自工會的會費；然而長久以來工會對工黨政府的影響力常僅限於被諮詢，自然感到不滿。早在一九五一年，工會即指責工黨政府視其支持為理所當然。工會不僅要求在社會與經濟政策上廣泛地被諮詢，同時也想要扮演一積極的角色。他們想要儘可能的控制工黨^③，尤其是在每次大選時，執政的工黨若在大選中失敗，而成為在野黨時，此種聲浪更大。一九七九年大選的結果，保守黨的余契爾夫人當選執政，使得此種要求更強烈。

而工黨的選區黨部自一九七〇年以來，大多數的黨員受過良好教育，較具政治技巧，而且較左傾的年輕一代已掌握了選區黨

註^① Richard H. Lead, "Thatcher's Britain", *Current History*, May, 1981, p.198.

註^② Glyn Parry, *British Government*, a revised ed. (London:Edward Arnold Ltd., 1979), p.64.

註^③ Leard Houghton of Sowerby, "The Party We Love",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52, No.2, April-June, 1981, p.149.

部的控制權。他們要求採行「社會主義政策」的聲浪日漸興起^④。同時有影響力的工會因不滿威爾遜與賈拉漢政府的所得政策（英國的所得政策是指每年政府與工會、雇主所舉行的工資談判後所決定的一般工資），亦增加了對工黨領導權的壓力。雖然選區黨部與工會爲了不同的理由，却都要求改變黨章，使得黨的領導權與議會黨團都在他們密切的控制下。

根據工黨黨章的規定，黨大會是黨最高的指導與控制機構。事實上，工黨議會黨團並不完全依據黨大會的決議行事，尤其是工黨執政時更是如此。當威爾遜擔任首相時，黨大會曾以絕大多數否決政府的所得政策。然而，威爾遜却說，黨大會不贊同所得政策，惟工黨政府視此種決議爲「警告而非訓令」^⑤。在未修改黨章前，議會黨團與工黨政府若拒絕實施黨大會與執委會的決議，大會與執委會並無任何良策可資對付。此一問題存在已久，然而此次工會與選區黨部的要求，並非僅止於喧嚷叫囂而已。黨內的活躍份子要求採行更廣泛的社會主義，而工會則欲擴大其影響力。兩者都希望產生一較能反應其意見的黨領導權。此一建議案的原則問題首先提出於去（八〇年）年十月的黨大會中。這些原則包括：1.削減議會黨團選舉黨魁與副黨魁的傳統權力，而代之以較大的選舉團選舉之。此一原則在大會中通過，惟選舉團的確定形式，則決定於一九八一年一月召開特別會議討論之。2.剝奪議會黨團任何參與制定選舉宣言的權力，使之成爲全國執委會的責任。此一建議案遭到大會的否決，而代之以執委會與內閣或影子內閣共同制定。3.確立期中重選候選人制度，包括國會議員，提供重選或取代原有候選人的正式機會，此一建議案爲大會所通過。

一九八一年一月溫布萊工黨特別大會中，制定了選舉黨魁與副黨魁的選舉團，其所包括的選票比例是工會佔百分之四十，選區黨部與議會黨團各佔百分之三十。此一決定否決了工黨新領袖富特（Michael Foot）所提的分配公式：議會黨團佔百分之五十，工會與選區黨部各佔百分之二十五。

這些黨章重大的修改，就表面而言，似乎是在削減工黨議會黨團的權力，使之不再成爲工黨的特權機構，從而更符合黨內民主的原則。然而，吾人若探究工會的決策過程，及執委會、選區黨部的組成，則不免如工黨右派人士一樣，懷疑此種變革是否更民主。工會本是爲工人爭取權益而產生，但在目前的制度下，並無任何的方式可表達一般工會會員的意見，工會的態度往往取決於少數以非民主方式（有些工會領袖是終身職）產生的工會領袖，更何況在工黨大會投票時，工會是投團體票。以今年工黨選舉副黨魁而言，最大的「運輸與一般工人工會」的地區分會曾於八月間投票表示支持現任副黨魁海利，但九月十八日其執委會却決定要工會代表選左派的邊恩（Tony Benn），經協議結果，決定在第一次投票中選西肯（John Silkin），第二次投票中則將一百二十五萬張選票投給邊恩（根據工黨黨章規定，選舉黨魁、副黨魁須過半數通過，否則應舉行第二次投票），足見工會難以代

註^④ *Ibid.*, pp. 149-150.
註^⑤ cited from Glyn Parry, *op. cit.*, p. 71.

表一般會員意見之一斑。因為工會並不是以代議的方式來表達工人的意見，而是以少數工會頭子的意見為決策，並以之訓令工會代表在黨大會中投票（團體票）。工會以此種方式投票，竟然掌握了選舉黨魁百分之四十的選票；執委會的成員有二十九名，其中工會即佔了十二名，工會很容易即可控制執委會，而執委會本身不對選民負責，却由其制定競選宣言；地方黨部有權重選國會議員，重選國會議員的制定，本乃考核議員勤惰與盡責與否，但在左派份子掌握選區黨部之下，不免要排除溫和派人士。這些工黨黨章的改革本身，無疑的是在加強黨對於國會議員的控制，並以黨大會的決議訓令議員，有違工黨右派人士一向所服膺的議會民主的原則。

當然，工會、執委會、與地方黨部自一九六〇年代末期有逐漸左傾的趨勢，更令右派人士懷疑，所謂更改黨章以促進黨內民主，不過是左派人士有計劃的奪權策略^⑥。一九八〇年工黨年會中所作退出歐洲共同市場、片面解除軍備等決議，更令部分右派人士覺得他們留在工黨仍然無法建立起可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⑦。「四人幫」遂於溫布萊會議結束後次日——一月二十五日，宣佈成立「社會民主會議」（The Council for Social Democracy），指責工黨長久以來漸與英國一般民眾脫節，且背叛其所標榜的議會民主，終致溫布萊大會的結果，竟使少數工會領袖有權指定未來的首相；並宣稱它將集合信仰社會民主主義者，建立起公開、無階級與更平等的社會。兩個月後，社會民主黨正式宣告成立。

三、社會民主黨的基本主張、權力結構與黨員背景

(一) 社會民主黨的基本主張

社會民主黨成立迄今，並未發表黨的宣言，亦未制定黨章，因為其領導人認為，在黨員沒有充分的機會討論與投票之前便發表宣言或制訂黨章，是不民主的。然而，這並非意味着社會民主黨是個沒有主張的政黨。相反的，吾人從「社會民主會議」成立時所發表的聲明，該黨成立後所公佈的「十二項任務」，及其與自由黨於六月十六日聯合發表的「英國的新開始」（A Fresh Start for Britain），再加上該黨自十月四日起在伯斯（Perth，位於蘇格蘭中部）、布拉德福德（Bradford，位於英格蘭北部）及倫敦三大城市巡迴召開，為期六天的全國代表大會所討論的事項中，都可以看出社會民主黨是個有主張又相當務實的政黨。

註^⑥ Shirley Williams, "Why We Left the Labor Party", *Washington Post*, March 3, 1981, p.A.13.

註^⑦ 一九七六年工黨右派人士會成立團體，邀請溫和派的海利，Roy Hattersley, Merlyn Rees, Eric Varley, Roy Mason 等人參加，以制定可行的社會民主政策，對抗工黨左傾的趨勢。

效從憲政體制、經濟政策、工業關係與政策、及外交與國防政策四方面，來論述其基本主張。

1. 憲政體制：社會民主黨認為，自二次大戰以來，「敵對的政治」(adversary politics)^⑨主宰着英國政壇，兩大黨分別代表中、上階級與勞工階級，其所堅持的教條，使其無法將全國利益置於特殊利益之前，造成社會階級的對立與政策上的不連貫性。社會民主黨將打破兩黨制度的模式，創造無階級的社會，使共同意識再度地重現於英國的社會中。

為了打破現有敵對政治體系的僵局，社會民主黨主張以比例代表制，替代目前「勝者全取」(winner takes all) 的選舉制度^⑩，因為此一制度無法反應出每個政黨在全國所獲得的票數，不但對選民不公平且易於造成極端主義，尤其是不利於無明顯的社會經濟認同或地域基礎的政黨。

小選舉區多數當選制被認為在兩黨制的運作下，不利於第三黨。事實上，它是不利於支持平均分佈的政黨，並非不利於支持集中的政黨^⑪。它並沒有不利於十九世紀的愛爾蘭國民黨，同樣地，它也有利於北愛爾蘭烏斯特拉省的統一黨。例如一九七四年二月的全國大選中，烏斯特拉省統一黨所獲選票僅佔總票數的百分之一點三，却獲得國會六百三十五席中的十一席；而自由黨所獲選票佔總票數的百分之十九點三，但其所獲議席僅比烏斯特拉省統一黨多得三席。而且此種選舉制度對像自由黨這類全國性的小黨所造成的損害，不僅止於統計上所顯示的，因為選民為使其投票能產生作用，會被迫改投兩大黨的票或乾脆不參與投票。這種選舉制度對社會民主黨亦屬不利，因為該黨的支持者可能亦與自由黨一樣，平均地分佈於全國；而不像工黨與保守黨一樣，票源分別集中在英格蘭北部與南部。今年二月二十一日，「經濟學人」假定自由黨與社會民主黨聯盟在下屆大選中可能獲得自由黨曾於一九七九年得到的全部選票，且可能在每個選區中獲得工黨選票的百分之三十，及保守黨選票的百分之十，則三個主要政黨獲票率與議席分配的結果應如下列：(見表一)

假如，「聯盟」的獲票率低於此，則其所獲得的議席將明顯的下降。「經濟學人」又曾假定其獲票率等於上表所列工黨的獲票率——百分之二十五點九，且其支持來源如上述的假定，則「聯盟」獲得的議席僅有二十席。奧克沙特(Matthew Oakeshott)與克爾寧(Peter Kellner

註^⑧ 此一名詞首次由 S. E. Finer 教授使用於他所編的 *Adversary Politics and Electoral Reform* (London: Anthony Wigram, 1975) 一書中。

註^⑨ 英國國會議員是採小選舉區多數當選制，在一個選區中只數出之黨多得一票，即取得該席位。

註^⑩ Vernon Rogan, "The Social Democrats and The Constitution",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52, No. 3, July-September, 1981, pp. 286-287.

表一：三黨派在下屆大選中假定的獲票率與議席

黨 派	獲 票 率 %	贏 得 的 議 席
自由—社會民主黨聯盟	34.9	142
保 守 党	33.9	295
工 党	25.9	183

) 亦曾推算出相同的結果^①。

因此，若不改變選舉制度，則社會民主黨不僅無法在不久的將來單獨執政，且難以增加其在國會中的議席。所以改變選舉制度也就成爲「聯盟」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後所要提出的第一個法案。一旦比例代表制得以實施，則兩大黨將不再能限制中間派政黨的成長，而且也將使英國的政黨政治從兩黨制變成多黨制^②，從而打破目前兩黨對立的僵局。

2. 經濟政策：社會民主黨認爲，英國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經濟政策沒有長期一貫的目標。目前，兩黨輪流執政，保守黨上臺即縮減國有化部門，工黨上臺即擴大國有化。實則英國所面臨的經濟困境，不是單以市場經濟或國有化能解決得了，必須採行混合經濟，才能使經濟在最有利的情況下復甦。

在失業問題方面，社會民主黨以完全就業爲其所追求的目標，惟須透過經濟成長來提供就業機會。短期內主張政府每年增加二十一三十億鎊的公共投資，以增加就業機會；並對剛從學校畢業的學生提供職業訓練，及現代化的就業申請制度。

在所得政策方面，社會民主黨主張採取彈性的所得政策，由「工會聯合會」（由受雇者工會所組成）與「工業聯合會」（由雇主所組成）共同制定短期與中程的全國經濟評估，並以此做爲談判工資與衡量物價的基礎，建立起彈性而持久的所得政策。詹金斯在十月九日的黨大會中，引介了倫敦政經學院教授泰威尼（Dick Taverne）所提出的「通貨膨脹稅」，主張政府對受雇者工資增加超過正常程度的所得，徵收一定比率的通貨膨脹稅，使所得與通貨膨脹不會呈現螺旋狀的上升。

3. 工業關係與政策：在工業方面，社會民主黨主張分權化，認爲政府在工業界所扮演的角色不能過分地誇大，且無明顯的證據顯示，政府官員比民營的經理人員或技術人員更擅長處理工業方面的問題。因此，政府對工業方面應管得更少而非更多。惟對經營不善的工業，政府應妥善地察看其原因，並基於失業問題的考慮或技術的更新，而決定是否加以干涉。

在工業關係方面，社會民主黨主張工業民主，促使工會對重大的問題，諸如罷工等，進行投票。對工會的政治捐獻，社會民主黨主張，工會在撥款之前，應讓其會員以方便而確實的方式，投票表決其所支持的政黨。

4. 外交與國防政策：社會民主黨在對外政策上主張應繼續參加歐洲共同市場與北約組織，並承諾對第三世界國家提供援助。是否應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曾在英國引起甚多爭議。一九七二年工黨影子內閣議決反對英國加入，詹金斯即曾爲此而辭去工黨副黨魁之職。一九七四年十月大選，工黨內部又因此一問題而爭執不休。威爾遜執政後，即舉行英國第一次的公民複決，

註① 穆羅 Matthew Oakeshott, *The Road from Limehouse to Westminster: Prospects for a Radical Realignment at the General Election*

(Radical Centre for Democratic Studies in Industry and Society, 1981); 諸 Peter Kellner and Gordon Reece in the *New Statesman*,

April 10, 1981.

註② Vernon Roganor, *op.cit.*, p.288.

當時有百分之六十五的選民參加投票，投票結果以超過二比一的絕大多數贊同繼續留在歐洲共同市場。惟工黨左派認為，歐洲共同市場破壞了英國的主權，且威脅就業機會，加速通貨膨脹，而屢提退出共同市場之議。今年工黨年會仍議決退出歐洲共同市場。

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認為，英國應脫離孤立島國的政策，繼續留在歐洲共同市場內，以擴展其政治影響力。且事實上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有助於英國經濟的發展。根據英國中央統治局的資料，英國對歐洲共同市場的輸出，在一九八〇年已佔其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二十，此一貿易收支亦由一九七九年二十六億三千萬鎊的逆差，轉變為一九八〇年七億一千萬鎊的順差。

在國防政策上，社會民主黨雖主張全面裁軍，惟須透過多方的協議，而非單獨片面的裁軍。歐文曾提出警告說，世界已無可避免地趨向核子戰爭，限武與裁軍是阻止這場核子浩劫的當務之急，惟限武與裁軍須透過國際談判來進行，才能確保世界的安全。威廉斯夫人亦說「裁軍是吾人的目標，惟其達成須透過艱難的談判，而非放棄西方的盟友；片面裁軍是無視於蘇聯核武器的大量建造，及其入侵阿富汗和對波蘭的威脅。」社會民主黨支持北約組織的決定，在英設置巡弋飛彈，但反對部署三叉飛彈及雷根總統生產中子彈的決定。

社會民主黨的其他主張尚包括：開發北海石油資源，並以其收益用於工業投資，改善公醫制度；提倡婦女地位、種族平等；保障宗教自由；加強地方自治等。

(二) 社會民主黨的權力結構與黨員的背景

社會民主黨不能在權力的真空中運作，因此自成立「社會民主會議」以來，「四人幫」即分擔各重要的工作：羅杰斯負責組織方面的事務；歐文負責領導社會民主會議的議員（彼時該黨有十一名國會議員，至社會民主黨成立時，已擁有十四名，目前已增為二十四名）；威廉斯夫人負責對外宣傳與發佈新聞；詹金斯負責研究黨的政策。至該黨成立之後，臨時規則規定，在未選出黨魁之前，仍由「四人幫」集體領導，並由「四人幫」與另外十人組織指導委員會，綜理黨內事務，包括起草黨章，與自由黨談判聯合事宜，必要時得推舉議員候選人。

九月二十二日，社會民主黨公佈了黨章草案，並提出於十月初所舉行的巡迴大會中，使黨章能廣泛地為黨員所討論。社會民主黨黨章的設計，一方面是在實現「四人幫」所承諾的給予每位黨員對黨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却賦予該黨國會議員有充分的獨立自主權。

社會民主黨的黨章草案是採取二元的領導制。一方面由國會議員選舉議會領袖，一旦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勝，則由議會領袖擔任首相。另一方面則由全體黨員，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黨主席。黨主席綜理國會外的黨事務，領導由四百人左右組成的「社會民主會議」。惟對議會領袖的選舉方式，不但「四人幫」有歧見，且在十月間的大會中亦頻頻引起爭議。詹金斯與羅杰斯認

爲，議會領袖應由國會議員推選，但歐文與威廉斯夫人則主張無論是黨主席或議會領袖都應由全體黨員選舉。此一問題若在明年二月所召開的特別制憲會議中無一致意見，則可能訴諸所有的黨員（以通訊投票的方式表決）。

「社會民主會議」是黨的議會，每兩年改選一次，每年至少集會三次，討論與正式通過黨的決策。惟該會議不得以其決定訓令國會議員，且在投票時無代表工會或公司的團體票。該會議另設「全國委員會」，性質類似於工黨的執委會，綜理國會外的黨事務，其成員由國會議員、地區代表及一些由全體黨員投票選出的代表所組成。該會議最基層的組織是區黨部（area parties），由數個選區所組成，負責與自由黨的地方黨部協調。區黨部之上是行政區（region）組織，得召開大會，並負責認可候選人名單，選舉代表參加「社會民主會議」。然而不管是任何階層的黨代表，都是一人一票，且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不同的性別。

總之，社會民主黨的黨章是根據政治應掌握於人民之手而制定，黨員有充分的機會來表達意見，但仍維持代議民主的特性，亦即黨大會不能以其決議訓令議員。

根據社會民主黨黨章的規定，凡英國國民年滿十六歲，不屬於他黨，且服膺開放、無階級的社會，健全的混合經濟，繼續支持英國在歐洲共同市場的會籍與多邊裁軍等基本原則者，社會民主黨都歡迎其加入。社會民主黨成立迄今，其黨員人數已由今年四月九日的三萬九千名，增為十月一日的六萬六千六百八十名，其所徵收的費用（七十五萬鎊），全部來自黨員個人所繳的黨費（每人每年九鎊）。

至於社會民主黨員的社會背景，根據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晚間新聞」（News Night）節目部對參加上述三個城市巡迴會議的代表所做的調查顯示，加入社會民主黨者有百分之四十五是工會會員，百分之五十五過去從未加入政黨，有百分之三十點二曾屬於工黨，百分之六點八曾屬於保守黨，百分之七點四屬於自由黨。此一結果證實了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所宣稱的，該黨已將勢力打入工會，並吸引了廣大過去從未加入政黨者。又據「晚間新聞」的訪問調查顯示，社會民主黨黨員有百分之四十八點七的人是專業人員與高級經理人，僅有百分之十是手工工人。惟該黨宣稱，這是因爲專業人員比工人更能抽空參加黨大會所致。古德曼（Goodman，「金融時報」記者）認爲，儘管社會民主黨充滿了中產階級的黨員，但在大會所召開的茶會中，各種職業均有，似乎比保守黨與工黨更能聚集不同背景的人士。^⑬

四、社會民主黨的活動策略——與自由黨聯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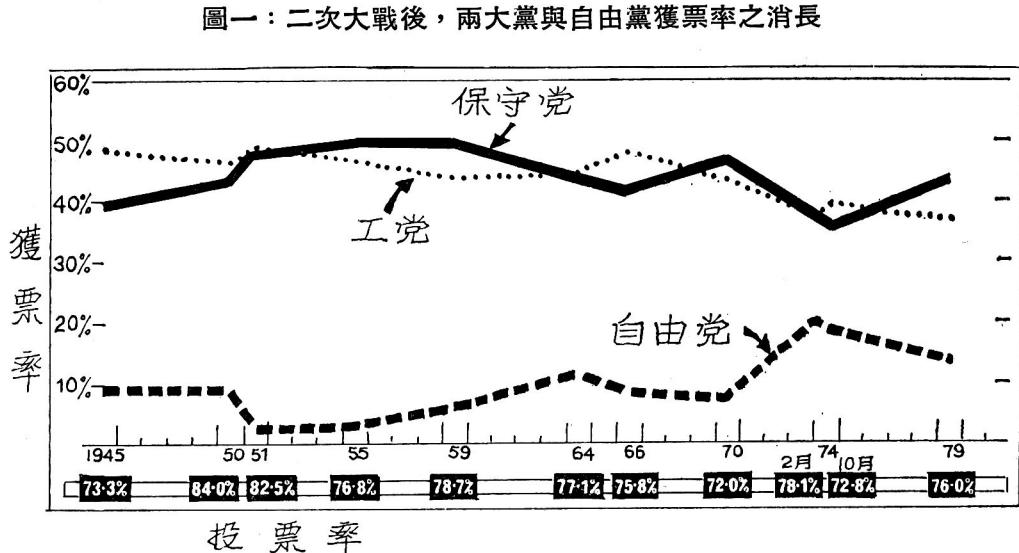
註^⑬

Elinor Goodman, "Poll Confirms middle-class stereotype but unions are well-represented,"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8, 1981, p.4.

社會民主黨是個新成立的政黨，它沒有歷史的包袱，既不像工黨一樣依賴工會，也不像保守黨一樣被工會視為敵人。它崛起於兩大黨都趨於極端之際，又擁有富於政治經驗的領導人，因此早在其正式成立之前，一般民意測驗所給予的評價都很高。然而僅僅做為一抗議性的政黨，是不足以在政壇上長久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遑論成為執政黨。況且依據英國目前的選舉制度，任何一個政黨，若不能獲得全部票數的百分之三十，則無論其主張多麼符合民意，亦難以發揮其影響力。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有鑑於此，遂於有意組黨之初，即頻頻與自由黨黨魁接觸，希望中間派政黨聯合作戰，突破目前兩黨制的模式。

自由黨自一九二〇年代即為工黨所取代，成為一小黨，至一九七四年二月的大選始獲得五分之一選民的支持。然而由於該黨無法讓其潛在的支持者確信其可能執政或加入聯合政府，故所獲支持始終有限；在另一方面，英國許多選民已對兩大黨逐漸感到不滿，此一現象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及七〇年代初期更為明顯。一九五五年支持兩黨的選民是百分之九十六點一，一九五九年是百分之九十三點二，一九六四年是百分之八十六點三，一九七四年二月是百分之七十五點九。一九七九年兩黨的獲票率雖稍有增加，却仍祇有百分之八十（參閱圖一）。在此情況下，自由黨如與社會民主黨聯合，不但執政的機會倍增，且可彌補其三十年來從未具有執政經驗的缺失（「四人幫」皆為前工黨內閣的重要閣員）。而自由黨黨魁史提爾（David Steel）策略上的首要指導原則之一，亦是實現聯合政府與使自由黨分享政權¹⁴。更何況，兩黨的聯合早在社會民主黨未正式成立之前，即普受民意的支持（見表一）。

註¹⁴ Peter Bartram, *David Steel: His Life and Politics* (London: W.H. Allen, 1981)。這是史提爾最真摯的傳記，Bartram本人會當過史提爾的研究助理，引自 Ian Bradley, "Where is the real David Steel?" *The Times*, September 17, 1981, p. 8.



表二：大選中的投票傾向

民意測驗	太陽報	每日郵報	衛報	每日郵報	泰晤士報	鏡報	週日泰晤士	鏡報
	聽眾選擇	全國民意調查	馬普蘭	全國民意調查	民意研究與傳播	蓋洛普	國際市場民意研究	蓋洛普
	1月28日	1月29日	1月29日	2月1日	2月9日	2月9日	3月8日	3月19日
只有自由黨參與大選	16		13	16	24	20	17	18
自由黨與社會民主黨分別參加大選			11	10	18	14½	13	13½
自由黨與社會民主黨組成聯合陣線		29	27	26	28	26	23	31
	51	39		41	44	44	30*	46

*所問的問題提示自由黨退出聯合陣線。

空白處表示該問題未曾在民意調查中被提出。

資料來源：*The Times*, March 20, 1981, p. 2.

自社會民主黨成立以來，兩黨即展開談判聯合事宜。六月十六日，兩黨共同發表第一份聯合公報「英國的新開始」，「聯盟」已篤定成立。惟正式的成立，仍須由自由黨大會通過。九月中旬，自由黨召開黨大會，會中「聯盟」之議普受代表的支持——一千六百名代表中，僅有一百一十二名反對；社會民主黨在十月的大會中雖未舉行投票，但其黨員亦熱烈地贊同「聯盟」。

社會民主黨第一個重要的競選目標，是七月十八日瓦靈頓區的國會議員補選。該區一向是工黨的安全選區，一九七九年的大選中，工黨在該區的得票率佔百分之六十一點七，保守黨佔百分之二十九；但在此次國會議員補選中，工黨只獲得百分之四十八點五的選票，社會民主黨獲得百分之四十二點五，保守黨僅獲得百分之七。社會民主黨所推出的候選人詹金斯（「四人幫」之一）雖未能贏得此一席位，但在工黨的安全選區能有如此高的得票率，不但詹金斯本人大感安慰，一般的社會民主黨員也受到很大的鼓舞。社會民主黨所獲得的票數有四分之三是得自保守黨，四分之一是得自工黨，其餘是自由黨一九七九年所獲得的票數。因此，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曾假定：如果每個選區的投票都像瓦靈頓一樣，則「聯盟」可在今後的全國大選中獲得五百零一個議席。當然，此一假設完全無視於各選舉區投票傾向的差異，其結果亦不可信！

「聯盟」所正式參與的國會議員選舉是可洛頓西北（Croydon-North West）區的補選。在該區的補選中，「聯盟」推出的候選人是自由黨的庇特（William Pitt）。庇特不僅非全國知名之士，亦非地方聞人，過去曾三次參與選舉（可洛頓市議員、大倫敦市議員與可洛頓西北國會議員），均告落敗；且在一九七九年的大選中，竟連保證金都被沒收。惟此次庇特本人以「聯盟」的候選人參加競選，竟然獲得了百分之四十的選票而順利當選。（保守黨獲票率為百分之三十，工黨百分之二十六）。

「聯盟」迄今最重大的一次勝利當屬克勞士貝（Crosby）區的國會議員補選。該區一向是保守黨最堅固的安全選區之一。

一九七九年的大選中，保守黨在該區比工黨淨贏一九二一七一張選票。但在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所舉行的國會議員補選中，社會民主黨的威廉斯夫人（「四人幫」之一）以百分之四九對百分之四十，打敗了保守黨（工黨獲票率僅百分之九）。此次補選不但為

社會民主黨贏得了一席，且顯示出「聯盟」有足够的實力，可以進逼甚至取代兩大黨的安全選區，從而提高了「聯盟」的聲望。
再就地方議員的補選而言，根據「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週刊於九月中旬所做的調查顯示，自七月一日起，在六十七個地方議員的補選中（超過十萬人投票），自由黨與社會民主黨淨贏二十六席，其中自由黨淨贏十八席（原有五席），社會民主黨淨贏八席。在這些案例中，兩黨雖未組成「聯盟」，但有某種程度的互助，且兩黨中僅有一黨推出候選人。另以「聯盟」名義參加的四十五個地方議員補選中（有九萬人投票），「聯盟」的獲票率為百分之四十點六，保守黨為百分之二十七點一，工黨為百分之三十一。^⑯

以上事實證明：社會民主黨與自由黨所採取的聯合策略，無論是在國會議員的補選上，或在地方議員的補選上，可說相當成功；且民意測驗亦顯示其普受一般選民的支持。根據過去三個月的「蓋洛普」、「全國民意調查」、與「國際市場與民意研究」三種民意測驗的平均結果預測，現在如果舉行大選，保守黨應可獲得百分之三十的選票，工黨與「聯盟」各獲得百分之三十五的選票。^⑰

然而，「聯盟」亦存在着某些威脅其合作的歧見。首先，按照「聯盟」所發佈的聯合聲明「英國的新開始」顯示，兩黨目前所同意的政策，都是屬於原則性的政策，且多涉及對外事務，包括繼續維持英國在歐洲共同市場的會籍、支持北約、多邊裁軍與更平均的分配世界資源。在國內事務方面，兩黨最主要的共同政策是選舉比例代表制。惟在國防政策上，社會民主黨主張支持北約的決議，俾在英國部署巡弋飛彈，但自由黨反對該項決議。在經濟政策方面，社會民主黨不贊同自由黨的市場機能。在能源政策上，自由黨關切環境甚於經濟成長，反對發展核能，且主張關閉已有的核能廠；社會民主黨雖主張尋求替代能源，但並未如此反對核能。在其他問題上，一般言之，自由黨較激進且理想化，社會民主黨則較謹慎與實際。惟政策方面的歧見，兩黨應較易達成協議，目前兩黨已聯合組成兩個政策委員會，分別研擬就業與工業復甦的政策。

其次，兩黨目前所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分配參與全國大選的候選人與選區。根據兩黨已達成的選舉協定，兩黨將各競選一半的議席；惟可依據各地區特殊的因素，稍加改變，不必嚴守百分之五十的規定。自由黨於一九七九年的大選中，曾在八十一個選區的獲票率佔第二位（簡稱為第一類選區）；另有七十二個選區，自由黨在一九七四年大選中的獲票率佔第二位，但在一九七

註⑯ 引自 *The Times*, September 17, 1981, p. 2.
註⑰ 這是「倫敦周末電視臺」的「倫敦節目」（London Programme）委託 CACI 在市場分析團體所進行的調查，而於十月十六日晚間播出。引自 *The Times*, October 17, 1981, p. 2.

九年的大選中降為第三（簡稱第一類選區）。自由黨認為，解決分配選區最簡便的方法，乃先將這兩類選區分配給自由黨，而讓社會民主黨在自由黨過去競選較不利的選區中競選，或至少將第一類選區分配給自由黨。

然而，社會民主黨却不同意此種分配方式。因為，自由黨勢力較大的地區集中於某些地方，最顯著的是集中於西南部、南部、與東南地區。如果讓自由黨競選所有的這些選區，則社會民主黨在這些選區中，將僅能有非常少的候選人參加競選。其次，此種分配方式將在大選中形成社會民主黨面對工黨和自由黨面對保守黨的局面^⑦，這不但在地理因素上很難為社會民主黨接受，且依目前的政治情勢而言，保守黨似乎是比工黨更容易被「聯盟」所取代。再者，在社會民主黨與自由黨的支持者中，專業人才與技術人員都佔很大的比例，自由黨較易贏得席位之選區，也很可能是社會民主黨較易贏得席位之選區。而且，在選戰中自由黨表現最佳的西南地區，社會民主黨亦已產生了一些最蓬勃的區分部。基於上述，未來兩黨在分配選區上，尤其是分配第一類選區上，將有一場艱難的談判。更何況，兩黨地方上的黨工人員可能並不像其領導人一樣，彼此具有深厚的善意^⑧。

無論如何，未來兩黨應會克服一切困難，共同推出「聯盟」的競選宣言與候選人，但在談判的過程中是否將損及兩黨間的善意（尤其是地方黨部，因為選區的分配原則上是由兩黨的地方黨部來進行），甚或造成貌合神離，此與兩黨聯合陣線未來的前途關係甚大。

五、結語

社會民主黨崛起於「余契爾主義」盛行於保守黨與邊恩主義盛行於工黨之際，因此在其未正式成立之前，即普受英國選民的支持。然而，「余契爾主義」並不等於保守黨，邊恩主義亦不等於工黨。社會民主黨必需建立起自己的認同，否則它將只是一短暫性的抗議政黨而已。

以社會民主黨目前的主張而言，基本上它仍未完全走出工黨的影子，而其黨員則以中產階級佔大多數。但其權力結構則不但在形式上比保守黨和工黨民主，且在此次的巡迴大會中，許多過去從未參與政黨者，均積極地參加該項會議，並嚴肅地討論黨的組織問題與其他政策。就此而言，社會民主黨是成功的，「四人幫」所標榜的民主政治確有吸引人之處。

尤其是社會民主黨與自由黨所組成的聯合陣線，透過傳播媒體的鼓吹，聲勢浩大，不但在一般民意測驗中，獲得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選民的支持，且在實際的選戰中，無論是國會議員的補選或地方議會議員的補選，獲票率均能達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前途看好的。故一般預測「聯盟」或可在人們對保守與勞工兩大黨失望之餘，一躍而成為執政黨，或取得三角平衡的地位，從而促使比例代表制的施行。如此，英國或將由兩黨交相執政的傳統轉變為多黨聯合政府的型態！

註^⑦ 自由黨於一九七九年獲票率佔第二位的八十一個選區中，有七十九個選區是由保守黨獲得該席位。而且在一九七四年一月的大選中，自由黨獲票率佔第一位的
一百四十六個選區中，僅有十八個選區是由工黨取得席位。

註^⑧ 有關兩黨分配選區的問題，請參閱 Ian Bradley, "The great carve-up: who stands where in the seats that could carry the day", *The Times*, September 11, 1981, p.9.